

●桐城派研究

方以智“异类中行”学术思想意蕴管窥

林存阳

(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,北京 100101)

摘要:明清更迭之际,思想界在反思明王朝灭亡原因时,将批判矛头指向理学,提出诸多挽救之道,从而呈现出以征实为特征的新学术转向。方以智就是这一时代学术新风气的型塑者和代表人物。其学术思想的形成,虽然源自于家学、庭训及老师王宣等之教,但能在此基础上有新的推进,并形成颇具学术个性的新特点。如著《性故》以儒家性说阐发“性善”;以《易》理为根柢,探索《易》中“公因反因”与“圆···三点”等重要理念;建构了体察事物本质的质测通几之学。方以智尽管迫于现实压力不得已而由儒入释,但他并未逃避,而是走向了以儒为主贯通三教的独特为学之路,从而在哲学思辨、经世致用方面取得新的突破。这一看似“异类”的人生、学术思想,实则彰显出方以智中道而行的通达、坚毅精神,和关注当世之务、学以致用务求实向。

关键词:方以智;异类中行;一多相贯;圆···三点;质测通几

中图分类号:G02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3-4730(2024)01-0013-08

收稿日期:2023-08-02

DOI:10.13757/j.cnki.cn34-1329/c.2024.01.003

基金项目: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“中华文明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研究”(22JD034)。

作者简介:林存阳,男,山东济宁人,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,博士。

明清更迭之际,很多学人在对明王朝社稷沦亡原因的沉痛反思中,将批判矛头指向理学(包括程朱理学、陆王心学)之弊。他们或批判理学之空疏,或在哲学思辨上修正唯心之偏,或摆脱朱、王而溯源于原典,提倡归本六经、经世致用,或着意于开创新的治学方法论,甚至对西学亦有所吸收,可谓多途并进、竞相迸发。这些努力,尽管受当时社会经济和时势条件的限制,不免“草创未精博”^①,然筚路蓝缕,锐意进取,实已展示出宏大的学术气象,以征实为特征的新学风、新思潮因之而起。其间,由儒而不得已入释、进而以儒为主贯通三教的方以智,是此一时代学术趋向的典型人物。关于方以智思想与学术的研究,一直是学者们关注、探讨的一个重点甚至热点,而《方以智全书》^②的出版,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、系统的文献资源。本文即以是书为基点,拟通过勾勒、比观方以智的相关思想和问题意识,探究其在易代之际学术思想转型过程中的志学取向所在,尤其是在传统学术基础上兼纳释道思想、耶稣会士所传西学,从而在哲学思辨、博物探索上所做出的新探索、取得的新成就、形成的新特点,以彰显其看似“异类”

的人生、学术思想,实则蕴涵着中道而行的通达、坚毅精神。管窥之见,祈请方家教正。

一、易代之际的志学取向

方以智,小名东林,字密之,号曼公,出家后名行远、弘智,别号药地、浮山愚者、极丸学人、墨历山樵、笑翁等,南直隶安庆府桐城人。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(1611年11月30日),清康熙十年十月初七日(1671年11月8日)去世,享年六十一岁,门人私谥文忠先生。明天启四年(1624)、十四岁,补弟子员;崇祯十二年(1639)、二十九岁,中举人,翌年中进士,授翰林院检讨。曾充任定王慈炯、永王慈炤讲官。

明清易代之后,方以智心怀故国,不仕新朝。因参与拥推桂王朱由榔,方以智被擢为右中允、侍讲学士,继拜礼部侍郎、东阁大学士。然鉴于南明政权官场的情势,他无意于宦途,而以续修国史为愿,故十辞永历帝入朝辅政之召。而为避清军之逼迫,他不得不于顺治七年(1650)冬在梧州出家。此后,他于顺治十年(1653)在南京天界寺圆具足

①黄德宽,诸伟奇主编,黄山书社,2019年版。

戒;十二年(1655),其父去世,以智破关奔丧,庐墓三年,之后四出游历,拄杖江西南城、新城、泰和诸寺;康熙三年(1664)冬,担任青原山净居寺住持,一直到康熙九年(1670)冬以老病退休。康熙十年(1671),受“粤难”牵连入狱,在被押赴岭南途中,十月七日夜舟行至万安惶恐滩,风浪忽作,方以智病发而逝。被誉为真孝子、真忠臣、真才子、真佛祖的“一代伟人”^①,历经入世、出世诸种波折磨难之后,遽尔与世长辞,虽有志未伸,但其所思所想,则为世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精神财富。

方以智自发蒙即聪慧,六岁知文史,七岁能赋诗,九岁属文、学平仄,十二岁咏六经、工书法、隶草皆习。十五、十七岁,先后从白瑜、王宣学,为学益进。在《咏怀诗》中,方以智尝表露志向曰:

人闻凤凰奇,安得高冈鸣?日日鸣高冈,耳目何尝惊?蔼蔼朝云布,莘莘梧桐生。远翔周八极,天下闻其名。岂同鸫鹑食,蒿下日相争^{[2]211}?

又曰:

十岁好击剑,舞衣动白日。醉后乱伤人,左右皆鼓慄。年年多读书,浮气忽已失。愁见世间人,相逢口如蜜。游侠慕荆卿,勾践叹无术。不如掩重扃,寒暑自却疾。矢志友古人,龟勉事著述。筮卦尝得《谦》,君子有终吉^{[2]213};

登楼且罢书,远望独愁予。上策荣金马,谈经慕石渠。知音邈已矣,高尚者谁与^{[2]275}?

而在致好友张自烈的函中,他更扼要地陈述了自己的读书为学经历。童年时,祖父方大镇先生即训导他“诵经读史,不咕哔制举义”,因此十五岁时,“十三经略能背讽,班史之书略能粗举”。其后,更是博览百家,而性好诗歌,“悼挽钟、谭,追复骚雅,殊自任也”。弱冠后,仰慕司马迁之壮游天下,遂更加狂放,“自行至性而不逾大闲”,曾满怀豪情地以为,从此以后:

以五年毕词赋之坛坫,以十年建事功于朝,再以十五年穷经论史、考究古今,年五十,则专心学《易》,少所受王虚舟先生《河》《洛》象数,当推明之以终天年,人生足矣^{[3]531}。

然而,明清之际一连串的动荡、兵火、宦途险恶,却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人生、治学的走向。尽管如此,方以智依然向学不倦,颇事著述,声名鹊起。

文震孟为方以智《博依集》作序,称誉道:

年甫弱冠,已著书数十万言。乐府歌行,直追汉魏;笔阵纵横,亦在晋唐间。其人复偏偏俊异,洵一时之轶材也。……吴会诸名人咸延颈愿交,老先生亦皆折行辈,称小友,惟恐不得当也,名噪吴会间籍甚^{[2]123}。

陈子龙亦赞道:

出其诗数百篇,诸体都有,大要归于极古。其才情超烈,有过济南,而挟旨则同矣^{[2]125}。

而据方以智自称:

弱冠灾木,数十万言,皆词赋也。后稍稍有所进,著作古文,皆不以示人;考辨经史,不敢与人言论,以末世恶人学问也。矢死倖还后,一切生平著作,所博记经史之疑,所收金石古文、文字之原,所考天官、舆图、律历、异记,所询边事、土情,俱灰烬矣^{[3]531-532}!

也就是说,方以智曾经下功夫做的很多文字未能留存下来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方以智曾有感于好友李雯所言“乐事莫过于好友同读书”,设想若能获得资助,打算建一草堂:

养天下之贤才,删古今之书,而统类之经解、性理、物理、文章、经济、小学、方技、律历、医药之故,各用其所长,各精其极致,编其要而详其事,百卷可举;惟史事与文诗至烦,补《纲目》而约《二十一史》,各以小传,比黄东发加详焉;诗文选二编足矣。身握其总,以其闲听而征之,十日一游山水,岂不畅哉^{[4]501}!

此可见其学问视野之大,与习八股制义而希图搏一第、荣身家者,迥异其趣。这也正是其发为:

每事但行其心之所安,率真毋欺,切忌伪饰。……津津以排突圣贤为新奇,为豪雄,是将谁谏^{[4]483}
浮夸吊诡,都不欲袭之^{[4]485}

今天下群役役于帖括,千百而一二,不过摹效诗古文章句^{[4]502}

之感慨的原因所在。

方以智之所以形成以上读书为学趋向,得益于其家学、庭训及老师王宣等之教。在《膝寓信笔》中,方以智记其父孔炤先生的教导曰:

文以析理、叙事、纪物,此外则溢言偏词,曼衍遣放耳。典故尔雅,所以远鄙倍,观其深也。不学无识,浮躁任气,安得不空疏以为灵,渔猎以为怪耶。

对此,他深有感触地说:

才自天分,各有独至,终不能忍。然如此者,已属间出。学识养气,是士子所当自造者也,不敢不勉^{[4]480,481}。

①《(康熙)桐城县志》方以智传语。

而从家学流衍来看,自方以智曾祖父方学渐以来,即已研学有绪。方以渐字达卿,号本庵,门人私谥明善先生,

潜心学问,揭“性善”以明宗,究“良知”而归实,摅去一切空幻之说,使近世说无碍禅而肆无忌惮者无所关其口^[53],

著有《性善绎》《庸言》(崇实、明伦、虚无、华夷、善、性、读天泉证道记、读李氏藏书)、《心学宗》等。祖父方大镇,字君静,号鲁岳,万历十七年(1589)进士,官至大理寺少卿,门人私谥文孝先生,绍述家学,著有《易意》《诗意》《礼说》《宁淡语》等,“皆干城儒教之书”,主张:

“性善”征诸仁义,仁义根于无为而为之心,此为至善,此为良知,此为穷理居敬^[57],

力排异学。父方孔炤,字潜夫,号仁植,万历四十四年(1616)进士,历官嘉定知州、职方员外郎、湖广巡抚等,门人私谥贞述先生,著有《周易时论》《周易图象几表》《明善述》等,创公因反因之说,会通朱陆,关注西学。一门三世,研学赅续,方以智浸润其中,自是深得熏陶。而其外祖父吴应宾,亦进士出身,精通儒释,宗一圆三,合三教而一之,以无我为至善、良知为醍醐,不废学问,亦不废物理。方以智之师王宣,迈志好古,中年学道,深于《易》学。据方以智称:

十七八即闻先生绪论,旷观千世,尝诗书歌咏间引人闻道,深者征之象数。其所杂著,多言物理。是时先生年七十,益深于《河》《洛》,扬、京、关、邵,无有能出其宗者^[6]。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方大镇、吴应宾、王宣三人,治学虽各有侧重,但常切磋论学,甚为相得。在《易余·三子记》《象环寤记》中,方以智曾以当士、平公、何生和赤老人、缙老人、黄老人为喻,对其祖父方大镇、外祖父吴应宾、师王宣代表的儒、释、道三教之思想主张及其贯通,进行了揭示。正是在对家学、外祖父之学和恩师王宣之教的学习、体味中,方以智从而形成自己的治学风格和特色,所著《东西均》《易余》《性故》《一贯问答》和《物理小识》《通雅》等,即其哲学思辨和质测通几之学的体现。

二、以儒为主贯通三教的哲学思辨

关于人性问题,方以智曾祖父方学渐,尝鉴于孟子之后性学不传,不唯荀子、告子不明性体,即使汉唐以来诸儒亦鲜有真知性体而无疑者,而往往

“以气参之”,甚且“引虚无之帙,窜入于‘性善’之中,浸淫不已”,所以著《性善绎》以辨之。在他看来,

性之说发源于汤,导流于孔子,砥柱障澜于孟子。“性善”一语,直溯本原,合符于降衷继善之旨,此孟子之所以承先圣也。……性一理也,理无不善^[53]。

他强调:

“性善”一语,孟子与羲、黄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仲尼同一血脉,亦与天下万世愚夫愚妇之未雕琢者同一血脉,同此者为同道,异此者为异端。告子之“无”与释氏之“空”同一血脉,天下莫不知其为异端。近儒以释旨乱性善,又吾道中之异端。此学术邪正、世道理乱之大关也^[56]。

此后,方大镇、孔炤亦绍家学,而对性善说续有论说。至方以智,更著为《性故》,对性之本来或所以然进行了阐发。

与先人立足正统、辟异学稍有不同,方以智则从《易》理、会通、合观的角度,提出新的认识。在他看来,性说虽然纷然,但“皆不离对待之二”,如说善则对恶、说有善恶即对无善恶,因此,欲加以折中,需反复合观而自参之。他的体会是:

唯通先后天而明其本自如是、正当如是、适可如是者,绝对待贯对待,是何理乎?知止至善而扬之,深几神哉^[77]!

基于此,他以问答的形式,对儒家性说、佛禅性说等做了阐释。大要而言,他认为,至善可统性善、性恶、性为善为恶、性无善无恶四说;《中庸》与《易》之性说一贯;圣人与众人皆性善,其不同在于圣人率性而众人率情;性与命一贯;礼义之性与食色之性、性与情、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,皆不可作两概观等。方以智强调:

人身一元气也,通身皆灵如也。……言空虚者,破气质之执;必言理,乃破气质与空虚之弊。理且破理,而理与事混,智与物混矣。以不用善其用,而以用善其不用,则善用为经矣。故决曰:“无心则泯善恶,而善用则贯有无。”……行无事必有事,毋自欺而好学,享其中和,岂复作有无之见^[723-24]?

张永堂先生曾指出:

方以智以儒家性说而贯通三教,可谓三教一贯而归性善^[74]。

可谓揭示了方以智《性故》之旨趣。而其所作《一贯问答》,亦是此一旨趣的体现。

《一贯问答》凡涉五个问题,即一贯、格致、仁智、忠信、克己。方以智指出:

圣门之几本一,而本不执一,其圆如珠。……不

能变即是不能权;不能权,不可与几;不可与几,岂可谓之贯!

所谓“一贯”,即:

一是多中之一,多是一中之多;一外无多,多外无一。……一多相即,便是两端用中;举一明三,便是体统相用。……即知两端用中之一以贯之,则三无非一而无非中,四不得中,无五无非五矣。

正是得益于《易》之一多相即的启发,他认为,与《华严》之阴阳参伍,“则可以六经、《五灯》作家常计俩矣”!不过,如果未达到“由己”的大透彻地步,却“捉个不落有无、捉个无所得,依然是病”^{[8]34-36}。本此“一贯”思想,方以智对格致、仁智、忠信、克己做了新的解读:

进而会通三教,以为都是一多相贯,有分别而无分别,无分别而有分别。最后归于明善实学,总归于孔子“学”字^{[8]29}。

而在《东西均》中,方以智则就对立与圆融、表象与本相、坚守与变化、相反与相因、公是与公非、颠倒与交互、生与死、奇与庸、全与偏、神与迹、译解与本名、道与艺、读书与著文、张与弛、象与数、世界与本原、宽容与错误、谋生与尽力、源与流、人心与鬼神、奥秘与认识等问题,进行了既辩证又一体的阐发。其思想主旨,即在于要阐明“两端中贯,举一明三”,也就是:

所以为均者,不落有无之公均也;何以均者,无摄有之隐均也;可以均者,有藏无之费均也。相夺互通,止有一实,即费是隐,存泯同时^{[9]243}。

方以智曾做了一个宏大的形象比喻,以表明其思想取向和意图所在。他说:

我以十二折半为炉,七十二为鞴,三百六十五为课簿,环万八百为公案,金刚智为昆吾斧,劈众均以为薪,以毋自欺为空中之火,逢场烹饪,煮材适用,应供而化出,东西互济,反因对治,而坐收无为之治,无我、无无我,圆三化四,不居一名。……是名全均,是名无均,是名真均^{[9]250}。

作为《东西均》姊妹篇的《易余》,乃方以智有悟于:

《易》无体而前用者,善用余也,即余而一其体用者也^{[10]9},

遂主张:

一在二中,皆相反相因者也。此明《易》之五种反对,因立六象同时之说、十错十综之说,而万法甚深,皆可累积钩钗矣^{[10]23}!

若不能明乎此,则会陷于执一而废百。因此,他一方面指出:

推论所以始,以一卵苍苍为太极壳,充虚贯实,皆气也。所以为气者,不得已而呼之。因其为造化之原,非强造者,而曰自然。因为天地人物之公心,而呼之为心;因其生之所本,呼之为性;无所不禀,呼之为命;无所不至,呼之为天。共由,曰道。谓与事别而可密察,曰理。

另一方面则强调:

若据质论,则有公性、独性、习性、大心、缘心、至理、宰理之分。此分合合分,分即是合者也。

要而言之,

不二不一之存泯同时,固万世之日用饮食也^{[10]29}。

方以智之所以做此思辨,归趣乃在于藉由对《易》之互相为余思想的阐发,以论证三教合一的合理性。这也就是他讨论“三冒五衍”所揭示的:

大一分为大二,而参两以用中五;从此万千皆参伍也,皆一贯也;三教百家,造化人事,毕于此矣^{[10]21}。

此一意向,《易余》附录更做了耐人寻味的总结,其言曰:

浴日蒸天,可不家食,何妨呼醒梦蝴蝶?瞥见鱼知跃、鸢能飞,尽覆载幽明外,九万游息,时时是怒化之鸱鸢。

烹雪炮漆,以供鼎薪,偏教医活死麒麟。却问龙无首、狐濡尾,在元会呼吸中,三五错综,点点皆触几之龟马^{[10]234}。

三、公因反因和圆·:三点说

方以智之所以能建构起对世间万事万物富有个性化的哲学思辨体系,乃缘于其对《易》的探索,和通贯儒、释、道三教的体悟。而更应注意的,是他从中凝练出一些重要的观念或理念。其中,以下两种尤其关键。

一是公因反因。在《周易时论》中,方以智之父孔炤先生已提出此一概念。据方以智说:

老父在鹿湖环中堂十年,《周易时论》凡三成矣。

甲午之冬,寄示竹关。穷子展而读之,公因反因,真发千古所未发。

因父之说,他感悟到:

万物各不相知,各互为用,大人成位乎中,而时出之,统天乘御,从类各正,而物论本齐矣。……著卦之德,退藏于密;即方是圆,两行贞一^[11]。

所谓“公因”,指“为物不二、至诚无息者”;而“反因”即“宇宙、上下、动静、内外、昼夜、生死、顿渐、有无,凡两端无不代明错行,相反而相因者也”。

方以智认为,公因在反因中,若“夺二穷一,并扫其一”,则“宗门权奇耳”。在他看来,“圣人极深而体寂感之蕴,因物而悟生成之符,观器而悟裁成之法,极数而尽天下之变,视曜纬官肢经络,就呼吸寤寐而定元会死生,一切皆卦爻之才,一切皆于穆之命”,因此,“历律医占,微几最秘”。正因如此,黄帝、神农造化在手,尧、舜知历数而授允中,孔子举扞闾而明大衍,“兴礼乐,制数度,成变化,行鬼神,橐籥在此”^{[12]77}。方以智在《东西均》中所表达的“有一必有二,二皆本于一”^{[9]279}“一在二中”^{[9]282}“一不可言,而因二以济;二即一、一即二也”^{[9]355}等,皆是此一观念的体现。所以,方以智之子中通曾强调:“公因一也,反因二也。此方氏之《易》学。真破天荒,一切皆然。”^{[13]258}

二是圆··三点。在为方以智所作年谱中,任道斌先生指出:

“··”字音伊,原为梵语中五十字母之一,密之借用之,以为事物变化,有如“··”字,左右交轮,而统一于中^[14]。

而观方以智著作,关于“··”的认识,有一个不断明确、深化的过程。在《易余》中,··已出现。方以智所作《三冒五衍》解题曰:

三教百家,造化人事,毕于此矣。处处是《河洛图》,处处是○、··、卍,行习而不著察耳。

但并未对··做说明。

在《一贯问答》中,方以智一则于《问一贯》中指出:

世自遁世,则不落有无,唯圣者能之。此乃别出圣体,与人着眼,而无可无不可之庸用,则圆··环中矣。……合看圆··之举一明三,即知两端用中之一以贯之,则三无非一而无非中,四不得中,无五无非五矣。……行无事必有事,即透彻交济之反因,而受用一贯之公因。勿正则不执上点,勿忘则不执右点,勿助则不执左点;一切俱从两不得逼至三不得,知到三不得,即三皆得矣^{[8]35-37}。

又于《问克己》中,以··对孔孟荀之思想做了解读。他认为:

《论语》终以“知命”“知礼”“知言”,此尼山··字也。始于“志”“立”,终于“顺”“从”,乃所以为“知命”,此是三一一三弄九一际。孟子之“知天”“践形”“知言”,亦此三昧;荀子之“云”“蚕”“针”,亦此三昧也。……知天,而原,反不作两橛矣。此格天人、格生死之物也。……知礼,则真谛中节,而性相不作两橛,此格内外、格本末之物也。……知言,则世谛立诚,而人我

不作两橛,此格彼此、格古今之物也。可与惟几也、惟深也、惟神也合参^{[8]60-61}。

而在《东西均·三征》中,方以智更对··之意涵做了较详细地阐述。他指出:

大一分天地,奇生偶而两中参,盖一不住一而二即一者也。圆··之上统左右而交轮之,旋四无四,中五无五矣^{[9]257}。

具体而言,即:

圆··三点,举一明三,即是两端用中,一以贯之。盖千万不出于奇偶之二者,而奇一偶二即参两之原也。上一点为无对待、不落四句之太极,下二点为相对待、交轮太极之两仪。三身、三智、三句,皆不外此。总来中统内外、平统高卑、不息统《艮》《震》、无着统理事,即真天统天地、真阳统阴阳、太无统有无、至善统善恶之故。无对待在对待中。设象如此,而上一贯二者而如环,非纵非横而可纵可横。中五四破,叠十用九,九即五,五即一,乃无实无虚,无可无不可,冥应双超者也^{[9]268}。

由此可见,··是贯穿于《易余》《一贯问答》《东西均》中的一个重要观念或理念。而此一观念或理念的落脚点,就是归于“一在二中”“藏一于二”。基于此,方以智更提出藏心于物、藏仁于智、藏无意于诚意、藏克己于复礼、藏悟于学、藏理学于经学等命题,其旨趣都是既辩证又关联、一体地看待事物。

四、质测通几之实学

方以智的哲学思辨,固然缘于其精研《易》理、释道二家之学并进而将其融会贯通之新得,而更为值得指出的是,此一新得亦基于他对事物的关注和体察,《通雅》《物理小识》即此一取向的体现。两者互动,遂孕育出方以智独特的质测通几之实学,亦彰显出其好言当世之务、经世致用的务实取向。

在方以智看来:

学惟古训,博乃能约;当其博,即有约者通之。博学不能观古今之通,又不能疑,焉贵书麓乎^{[15]6}?

又指出:

函雅故,通古今,此鼓篋之必有事也。不安其艺,不能乐业,不通古今,何以协艺相传,诂曰训诂小学可弁髦乎?理其理,事其事,时其时,开而辨名当物,未有离乎声音文字,而可举以正告者也^{[15]5}。

《通雅》之撰,就是方以智此一思想取向的体现。

据方以智自称,他从小时候即对器物技艺、字义诂释等怀有浓厚兴趣:

与方伎游,即欲通其艺也;遇物,欲知其名也;物理无可疑者,吾疑之,而必欲深求其故也;以至于颓墙败壁之上有一字焉,吾未之经见,则必详其音义,考其原本,既悉矣,而后释然于吾心^{[15]3}。

随着读书渐多、阅历渐广,以及熏陶于父师之教之学,他遂藉《尔雅》之体例,仿郑樵《通志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无所不该之规模,将所得汇为《通雅》一书。是书初成于明崇祯十二年(1639),其后又不断有所增补、修订,至康熙五年(1666)由姚文燮刊刻行世,凝聚了方以智几十年的心血。

《通雅》包括卷首3卷和正文52卷,内容包罗宏富,大而有要,洵可谓洋洋大观。要而言之,此书主于折衷音义、辨当名物,其辨证以经史为本,旁及诸子百家、志书小说,藉考究以寓“藏智于物之道”^{[15]10-11},于“古今聚讼,为征考而决之,期于通达,免徇拘鄙之误,又免为奇僻所惑”^{[15]5}。对方以智此书,西顽道人尝评价道:

凡天人经制之学,无所不该。其大指,尤在乎辨点画,审音义,因而考方域之异同,订古今之疑讹。……引据古文,旁稽谣俗,博而通之,总之不离乎雅者近是^{[15]2}。

冒怀辛先生亦高度赞誉说:

《通雅》一书不仅是当时条件所能达到的各种知识的汇集和考证,更重要的是在其中包含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,开明广阔的历史眼力,和综合会通的知识分类。……它在中国文化史、自然科学史、以及思想发展史上都起了一部分承先启后的作用。这是《通雅》一书的历史意义所在^[16]。

与《通雅》相得益彰,方以智所著《物理小识》,更分天类(气、光、声、律、五行)、历类、风雷雨晦类、地类、占候类、人身类、医药类、饮食类、衣服类、金石类、器用类、草木类、鸟兽类、鬼神方术类、异事类,阐发其对天地自然事物之所以然的认识。方以智何以会关注于此?主要有如下几个因素:

一是受其父孔炤先生思想的影响。在《知言鉴》中,方孔炤强调:

诂家沾滞彼道簧鼓久矣。曰宰理、物理、至理,曰公性、独性、习性,曰质测,曰通几,姑离合而陈之,乃可决耳。不明其故,即能守垒,亦强作主,不自在也^{[12]86}。

又在《潜草》中指出:

言义理,言经济,言文章,言律历,言性命,言物理,各各专科。然物理在一切中而《易》以象数端几格通之,即性命、生死、鬼神,只一大物理也^{[13]109}。

方以智熏陶于父亲之教诲,自然对此一思想和认

识深有感触。

二是受其师王宣启发。王宣为学,多言物理,著有《物理所》。崇祯四年(1631),方以智年二十一岁,刊刻《物理所》。此后,他更注意于此,每有所闻所得,即分条别记,以求其通。

三是得益于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。方以智曾阅利玛窦《天学初函》,虽然“读之多所不解”,但对历算奇器颇感兴趣,二十六岁时结识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,以此相问,尽管毕氏“不肯详言”^{[4]502},多少会有收获,很可能因此更激发起其探究热情;二十八岁时,方以智又获得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所著《西儒耳目资》,因其“字父十五,母五十,有甚、次、中三标,清、浊、上、去、入五转”,证明了他的“等切”之学^{[4]494}。

基于这些夤缘,方以智遂加以融贯,而形成自己对物理的新认识。在他看来,

盈天地间皆物也,人受其中以生。生寓于身,身寓于世,所见所用,无非事也。事,一物也。圣人制器利用以安其生,因表理以治其心。器,固物也;心,一物也。深而言性命,性命,一物也。通观天地,天地,一物也。推而至于不可知,转以可知者摄之。以费知隐,重玄一实,是物物神之深几也^{[13]96}。

尤为关键的是,为探究物之理,方以智在其父所揭质测、通几的基础上,将质测、通几作为核心命题,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释和运用。他指出,所谓“通几”,即“寂感之蕴,深究其所自来”,所谓“质测”,即“物有其故,实考究之,大而元会,小而草木昆虫,类其性情,征其好恶,推其常变”,而“质测即藏通几者也”;如果“竟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宥密之神者,其流遗物”,则不能合内外、贯一多;传教士所传西学,虽然详于质测,但“拙于言通几”,而深究起来,其“质测犹未备也”^{[13]96}。由此可见,方以智探究物理的目的乃在于识其“几”。

不过,方以智虽然定义了“通几”,但何谓“几”尚不明显。而观其相关言说,或可有助于理解其意涵。在《物理小识》开篇,方以智“象数理气征几论”曰:

为物不二之至理,隐不可见。质皆气也,征其端倪,不离象数。彼扫器言道,离费穷隐者,偏权也。日月星辰,天悬象如此;官肢经络,天之表人身也如此;《图》《书》卦策,圣人之冒准约几如此。无非物也,无非心也,犹二之乎?自黄帝明运气,唐虞在玑衡,孔子学《易》以扞闢衍天地之五,历数法度,是所首重,儒者多半弗问,故秩序变化之原,不能灼然。何怪乎举礼

节乐律而弁髦之,举伦物旧章而放弃之,谓为圣人之所以增设乎哉!……天示其度,地产其状,物献其则,身具其符,心自冥应,但未尝求其故耳。学者静正矣,不合俯仰远近而互观之,又何所征哉^{[13]111}!

而在《东西均》中,他更论“何谓几”曰:

交也者,合二而一;轮也者,首尾相銜也。凡有动静往来,无不交轮,则真常贯合于几,可征矣。无终始而有终始,以终即始也。……则生死、呼吸、往来、动静无不相即,并不相坏,皆贯者主之;此所以代也、错也。所以代错者,无息之至一也^{[9]265}。

又其《所以》一文强调:

气也、理也、太极也、自然也、心宗也,一也,皆不得已而立之名字也。……人本天地,地本乎天,以天为宗,此枢论也。天以心予人,人心即天,天以为宗,即心以为宗也。……不通天地人之公因,即不知三圣人之因,即不知百家学问异同之因,而各护其门庭者各习其药语,各不知其时变,何尤乎执名字之拘拘也?吾折衷之而变其号曰“所以”,此非开天辟地之质论而新语也耶!……生生者,气之几也,有所以然者主之。……所以然即阴阳、动静之不得不然,中而双表,概见于形气。……《易》者,征天地之几也,日月、魂魄之率也。……所以为心者,即所以为理、所以为气、所以为太极、所以为自然者也。……吾故又变“所以”之号,旧谓之“太虚”,我何妨谓之“太实”?旧谓之“太极”,我何妨谓之“太无”?且谓之“生生”,且谓之“阿阿”,又安往而出吾宗乎^{[9]341-345}?

而在致三子中履书中,他亦表示:

“物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为已有;力恶其不出于己也,不必为己。”此《物理小识》之随人集证也。托人问人,皆不犯其锋芒,而以通几护质测之穷,何所碍乎?《时论》以秩序变化、寂历同时为宗。方圆同时,奇恒之府,即多是一,皆统类于此矣。……格物之则,即天之则,即心之则,岂患执有则胶、执无则荒哉^{[17]135}!

合观以上所论,方以智以《易》理为根柢、融汇三教而对天地事物穷究其所以然及其密切关联性,亦即“几”的彰显,也就比较清晰了。

此一基于实征而对事物本质所做的探索和呈现方式,若与西晋张华《博物志》、宋僧赞宁《物类相感志》、明邓元锡《物性志》、明清之际王宣《物理所》等观照,可见方以智在借鉴、吸纳前人智慧和成果的基础上,做出了新的尝试。方以智自称:

每因邵蔡为嚆矢,征《河》《洛》之通符,借远西为郛子,申禹周之矩积。……或质测,或通几,不相坏也^{[13]101}。

方以智之子中通指出:

至于《物理小识》,为破天荒之书,天地人物,无所不包,古今疑惑,无所不决^{[18]23}。

四库馆臣指出:

张华、赞宁所撰,但言克制生化之性,而此则推阐其所以然。虽所录不免冗杂,未必一一尽确,其所辨论亦不免时有附会,而细大兼收,固亦可资博识,而利民用^[19]。

诸伟奇先生则将方以智的物理研究特点概况为四点:一是“为了求得物理的正确知识,方以智特别重视观察与试验以‘征其确然’”;二是“借助西方科学,以发扬我国的科学研究传统”;四是“表达了物理通于《易》理的理念”;而第三点则强调了“讲求物理研究的经世致用”:

全书十五类中的数千条,几乎每条都与日常生活有关,都有实用价值。如:天文历算类讨论岁差、日月食、历法、开辟纪年、节度定纪等,都是当时修历运动中争论不休的问题;医药类上个人习医之经验与心得;其他如转水法,介绍由低处引水灌溉高地之法;称杆轮运、起重法介绍省力起重的方法等等^{[13]90-91}。

如果联系明清之际动荡的社会状况来看,方以智能如此关注博物之学,著成百科全书式的《通雅》《物理小识》,不仅难能可贵,而且于一时学风和学术走向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无怪乎晚清学者谭献评价道:

方明中叶,问学之途或岐或窳,独方氏累叶敦儒,濯于忠节,以历文章。其为学也既世,又不为昌狂无涯之言,束经教而推究世用。……至于我朝通儒辈出,以名物训诂求微言大义于遗经,寻厥滥觞,实始于密之先生之《通雅》。然则桐城方氏七世之学,不独灵皋侍郎文辞授受之先河,抑亦阎、顾之流一代经师之先河也已^{[20]134-135}。

此一评论虽不免誉之稍过,但方以智确属明清之际与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等并时而鸣的开风气者。

五、结 语

综观方以智一生,其出处皆迭遭磨难,尽管他人“或以为词客,或以为狂生。……穷理者嫌其异于宋儒,而非之者有矣”,但他自己并不为世俗利禄所诱,亦“不为边幅以自雕饰”^{[3]532},而以旷达的心态、坚韧的毅力,执著于学问的探究、三教旨趣的贯通、天地万物的质测与通几,从而在哲学思辨、经世致用方面取得新的突破。

方中通曾说:

《易》本以象数为端倪,而神明其中,道器费隐,不相离也。……老父会通之日,虚空皆象数,象数即虚空,神无方,准不乱,一多相贯,随处天然,公因反因,真发千古所未发,而决宇宙之大疑者也。嗟乎!掠虚易,实学难,贯一切而会通者尤难^{[18]15}。

方以智弟子梅文鼎亦强调:

不历刀兵水火患难生死,不足以见吾师之学;不历才人、孝子、忠臣、善知识,不足以尽吾师之学。天之所以厄吾师者,正天之所以成吾师也。……吾师所以通乎世出世之法,而后以出世为入世。素位也,时宜也,不求人之知,不白己之心^[21]。

然而,时势弄人,天未必遂人愿,本想用世、成就一番事业的方以智,面对南明政权的不堪、清廷的逼迫,心怀遗民之志的他,不得已而选择了“异类中行”,藉会通三教而申明己愿。此一孤怀苦心,方中通所言:

生前应出世,身后合归儒^{[18]114};
老人本传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周之道,转而集诸佛祖师之大成,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周之道寓其中:时也,非人也。……老人之时乘也,以无我为过关,以不自欺为薪火。合尼山正示、鸢岭大过、漆园旁击而一之。明乎公因反因、正知偏知、证此五位天然秩序、寂历同时之大符,……谓老人为杖人托孤,即为诸佛祖师托孤,即为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周托孤,实为孔子托孤也^{[17]170-171}。

可谓深得其父思想之三昧。

[参考文献]

[1]章太炎.章太炎全集:第三册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8:482.
[2]方以智.博依集[M]//方以智全书:第八册.黄德宽,诸伟奇.合肥:黄山书社,2019.

[3]方以智.浮山文集前编[M]//方以智全书:第九册.黄德宽,诸伟奇.合肥:黄山书社,2019.
[4]方以智.膝寓信笔[M]//方以智全书:第八册.黄德宽,诸伟奇.合肥:黄山书社,2019.
[5]方昌翰.桐城方氏七代遗书[G].彭君华,校,点.合肥:黄山书社,2019.
[6]方以智.浮山文集后编[M]//方以智全书:第十册.黄德宽,诸伟奇.合肥:黄山书社,2019:25.
[7]方以智.性故[M]//方以智全书:第三册.黄德宽,诸伟奇.合肥:黄山书社,2019.
[8]方以智.一贯问答[M]//方以智全书:第三册.黄德宽,诸伟奇.合肥:黄山书社,2019.
[9]方以智.东西均[M]//方以智全书:第一册.黄德宽,诸伟奇.合肥:黄山书社,2019.
[10]方以智.易余[M]//方以智全书:第一册.黄德宽,诸伟奇.合肥:黄山书社,2019.
[11]方以智.药地炮庄[M]//方以智全书:第二册.黄德宽,诸伟奇.合肥:黄山书社,2019:183.
[12]方以智.青原志略[M].张永义,校,注.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12.
[13]方以智.物理小识[M]//方以智全书:第七册.黄德宽,诸伟奇.合肥:黄山书社,2019.
[14]任道斌.方以智年谱[M].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1983:256.
[15]方以智.通雅[M]//方以智全书:第四册.黄德宽,诸伟奇.合肥:黄山书社,2019.
[16]方以智.通雅[M]//方以智全书:第一册.侯外庐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8:16-17.
[17]方以智.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[M]//方以智全书:第三册.黄德宽,诸伟奇.合肥:黄山书社,2019.
[18]方中通.陪集[G]//清代诗文集汇编:第133册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.
[19]永璿,纪昀,等.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:第867册[M].台北:商务印书馆,1986:741.
[20]谭献.谭献集[M].罗仲鼎,点,校.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2.
[21]方中通.心学宗续编[M]//四库全书存目丛书:子部第12册.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.济南:齐鲁书社,1995:208.

责任编辑:陈寿富